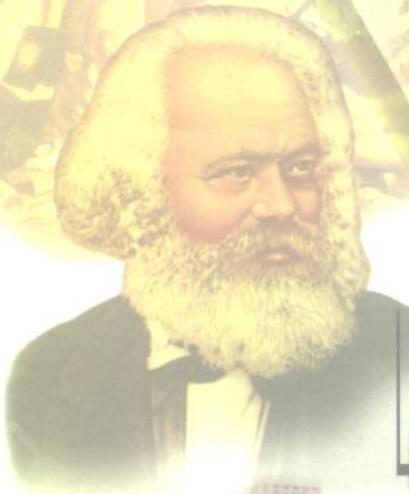


■ 李惠斌 著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 与哲学研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与哲学研究

李惠斌 著

黑 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
1998 年 · 哈 尔 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哲学研究

SHEHUIZHUYICHUJIJIEDUANLILUNYUZHEXUEYANJIU

李惠斌 著

责任编辑:崔伟奇

封面设计:孙少江

责任校对:晓 源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哈尔滨市工大节能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6.875 · 字数 160 千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16-3373-6/B · 55 定价:10.00 元

目 录

导 论 邓小平理论：传统思维方式的解构与重组 1

上 篇 邓小平理论与《共产党宣言》

第一章 邓小平理论与新时代的共产党宣言	15
一、中国改革与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15
二、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21
三、新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及其意义	25
第二章 公有制实现形式知多少	32
一、研究公有制不能超越阶段	32
二、消灭私有制不等于消灭私人财产	36
三、公有制实现形式知多少	38
四、股份合作制是一种重要的公有制形式	41
五、公有制与按劳公配	44
第三章 重新认识按劳分配问题	46
一、怎样理解“按劳分配”	46
二、三种不同的国有企业分配方式	51
三、改革开放对按劳分配提出的新要求	54

四、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	56
五、第三次产业革命对分配方式改革的要求	58
六、按劳分配政策是富民政策	60
七、按劳分配与贫富差别	62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	64
一、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	64
二、社会主义是不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过程	67
三、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70
第五章 社会主义与收入差别	74
一、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承认收入差别	74
二、收入差别导致社会不同阶层的存在	76
三、社会主义不存在利益根本冲突的阶级对立	79
第六章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82
一、两种意识形态之争	82
二、全球资本主义，还是全球社会主义	84
三、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	85
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悖论思维	90
第七章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趋势	94
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五大发展趋势	94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出现五大趋势的原因分析	101
三、意义和对策	105
第八章 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107
一、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	107
二、全球化理论与现时代	110
三、全球化理论与未来社会发展	114
第九章 呼唤新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116

一、社会主义在价值观上是一种集体主义	116
二、集体主义的内涵在我国的演化	118
三、新集体主义的确立	121
第十章 打开姓“资”姓“社”问题上的思想枷锁	127
一、“社会主义”是一个总体概念， 不能用来指称个别企业和地区	127
二、不能把“社会主义”概念与 “公有制”概念相混淆	129
三、对“公有制”的理解应该深化	131

下 篇 对哲学问题的重新思考

第十一章 传统思维方式批判	137
一、本体论哲学或“基础主义”批判	137
二、“深度消解”和形而上学批判	139
三、教条主义和新本本主义批判	141
第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辨析	143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引入认识论”的说法不妥	143
二、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能作抽象理解	146
三、实践与物质的冲突	148
第十三章 实践第一性对物质第一性的扬弃	153
一、对形而上学唯物论的三种批判	154
二、实践第一性对物质第一性的扬弃	156
三、新唯物论的立脚点是实践	158
第十四章 关于唯物主义与历史的统一	162
一、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统一与对立	162

二、从物的意义上理解现实和从实践的意义上 理解现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	169
三、唯物主义与历史的统一 是对自然本体论的批判.....	174
四、唯物主义与历史统一的现实意义	181
第十五章 两种不同的唯物论.....	185
一、两种不同的唯物论.....	186
二、主体性原则与客体性原则	188
三、关于实践之外是否有物存在的争论.....	193
第十六章 唯物、唯心对立的可超越性与不可超越性	
.....	198
一、超越论 200 年回顾.....	199
二、马克思主义超越论的实质.....	206
三、唯物、唯心对立的不可超越性.....	210

导 论

邓小平理论： 传统思维方式的解构与重组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整整 20 年过去了。这 20 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从政治到经济、从思维方式到生活方式都进行了全面解构和重组的年代。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也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思维结构，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政治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主要表现在我国正在全面走向法治化，一个健康有序的现代化民主和法治国家正在世界的东方屹立起来。全民普选制度正在全国县以及县以下行政区域全面展开，为进一步的政治民主准备着各种必要的条件和前提。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健全，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法治国家的行列。司法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律师提前介入制度的建立，更使得法律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得到了保障。此外，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权力和作用的加强，使得以上各项民主和法律制度的实施得到了根本性的保证。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提出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这一切如果同 20 年前相比，其变化和进步程度，是 20 年前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

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是贯穿在 20 年改革中的主线和核心，其最大的结果是明确提出并初步走上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道路。实际上这条路已经走了 20 年，而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济结构的内容很多，除了带有根本性的所有制结构以外，还有生产结构、资本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正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全面变化，带动着其它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带动着人民生活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解构和重组必然带来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解构和重组。而这种解构和重组的先导思想就是邓小平理论。从组织发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到进行大刀阔斧般的改革开放，从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到江泽民同志的十五大报告，几乎每一步都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带来了思维方式的解构与重组。三次思想大解放，带来的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三次大解构。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像一幢幢老式建筑一样在改革大潮中解体了，也不得不解体。邓小平理论以它特有的方式和风格，带来了强大的冲击波，摧毁了束缚中国几十年、铁板一样僵硬的“左”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终于认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认清了我国目前和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我们的一切理论和政策都不能人为地超越这个阶段。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是多方面的。它的最终结果就是全面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邓小平理论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冲击作用是多方面的，在笔者看来，主要地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解构教条主义，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教条主义是危害中国人最久的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一个国

家、一个组织或一个个人，其行动总要有一定的思想作指导。而思想可以有一种承继关系，不一定事事都要“摸着石子过河”，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说，人类可以继承前人的一些思想，以指导现在的行为。但是，把前人的思想拿来作为现在的指导思想，必须时时记得，前人的这些思想不应该被当作不变的教条，而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但是，人的智力情况各有不同，具体地说，各个个人或各个不同时代的人的智力有所不同。所以“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句话虽说大家都知道，但真正行动起来就不简单了。有些人或有些时代的人就会表现的聪明一些，而另一些人或另一些时代的人就会表现得不够聪明。所以，“郑人买履”的事情总会在一些地方发生，就不足为怪了。中国革命时期有王明式的“郑人买履”，以大本本、老尺寸唬人。后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郑人买履”事件。“文化大革命”教条主义发展到极点，满街满地的人都举着红本本，说话前要先念语录，吃饭前要先念语录，干活前要先念语录，国人的一举一动，都要以语录为标准，以“最高指示”为标准。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能只怪一个林彪或其他一个什么人，这是当时国家的政治状况和国人的素质所致。邓小平同志刚出来工作时，他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两个凡是”就是他要面对的一种思维定势。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一种典型的教条主义思维定势。

邓小平同志从批判“两个凡是”入手，对教条主义进行了全面彻底地反击。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邓小平同志又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①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邓小平同志的这些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对多年形成的教条主义思想的一个沉重打击,对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全面拨乱返正,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工作。

后来,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归结为“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我国多年来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个法宝。只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这条最基本的思维原则被太久地忽视了,以致于给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损失。邓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智慧和胆略,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这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式。

不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握到当前实事或实际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9页。

的本质。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们讲了几十年，为什么总出现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的事情呢？这就是我们对这样一个重大的事实或实际没有把握住：即我国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一直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一直等了半个世纪才认识到，这一点在我们讨论“实事求是”的时候不能不引起重视。这就是说，“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所谓“实际”，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在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是在今天才真正可以说是实事求是了，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能说是执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重新确立了实践对于哲学和思想的基础地位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把实践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没有实践的观点，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整个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们谈的都是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意义。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重视实践的重要地位。他的哲学著作不叫“唯物论”，不叫“辩证法”，也不叫“历史唯物论”，而是起名为“实践论”。可见，毛泽东同志对实践概念是情有独钟。他对我国历史上的“知与行”的概念，特别是对于实践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阐发，提出了“实践是认识形成的基础，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著名实践理论。上面的所谓实事求是，其哲学基础，就是实践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但是，建国几十年来，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对它的唯物论的重大意义，却一直没有被我国的理论界真正理解。大家一直把旧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当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长期没有看到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重大意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才把这个问题

认真地提了出来。这次大讨论的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是大家都熟知的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铁的事实面前，一切传统的思维方式，一切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而又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一切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一时间，都被解构了，破坏了，瓦解了。过去一度被认为是永恒的和不朽的东西，一时间像冰山一样瓦解了，粉碎了。实践，显示了它强大的威力，而把握这个实践的邓小平理论，更是爆发出了从未有过的思想威力。

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每一次理论上的突破，都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都带来全国上下改革开放实践的重大的突破性进展。而在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正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总结。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而且改变着人们的全部生活方式。

（三）话语模式的重大转变

邓小平理论带来的话语模式的转变，是一种深层次的转变。理论家太多地关注“大本本”，关注“体系”，许多人动不动就要创造一个体系。自然而然地，大家就形成了一种习惯，似乎只有成体系的东西，才是理论，才有理论意义。所以，本子越来越厚，内容越来越多，说得越来越叫人看不懂。因为只有别人听不懂的，才是深奥的，才可以显示学问。这已经成了一种时尚：本来是简单的道理，用深奥的、一般人听不懂的语言说出来，才显示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也是如此。实际上，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大部头的哲学著作，但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哲学教科书，却越来越厚。你也一个体系，我也一个体系，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真可谓层出不穷。这就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话语模式，西方人称之为“大叙事”。这个称号比较形象。在我们这里，突出的特点是“假、大、空”。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批判“党八股”时说的那样，是“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种文风,而是发展为一种思维方式。似乎不这样就说不清楚,不这样就不称其为理论。

就像当年王明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一样,“邓小平没有理论”这句话在一个时期是常听人说起的。一年前笔者编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栏目中设有“邓小平理论”一栏,就很引起一些非议。所以,对邓小平有没有理论的问题,体会更特别一些。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几乎每一个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人物都会出现一个“有没有理论”的问题。马克思没有留下大部头的哲学著作,所以,有人说马克思没有哲学理论。还是列宁出来为马克思说话,说马克思虽然没有大部头的哲学著作,但马克思为我们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王明曾经认为毛泽东同志“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他的那些大本本才是马克思主义。到了邓小平又是如此。有人曾说:“毛泽东有两论:《矛盾论》和《实践论》,而邓小平也有两论,那就是‘猫论’和‘摸论’”。言外之意,这两论是拿不上台面的。但是,其不知正是这个“拿不上台面”,正好反映了邓小平话语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类似“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以及“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一些形象、诙谐的语言,虽然拿不到教条主义的“台面”上,但却反映了一个大的智慧,反映了一种实事求是思想的本质。用老百姓的话语,表达深刻的道理,这就是邓小平话语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邓小平话语模式的另一个特征是“藐视大本本,提倡少而精”。邓小平告诫全党同志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读书是如此,写文章,作报告,也是如此。邓小平同志几乎从来不作长篇大论的报告。而且,他的许多重要思想都是在如外宾和同事的谈话中表达出来的。他的这个话语特征,用计算机时代的语言来说,叫作“碎化”或“零散化”。“大本本”是大体系,是“大叙

事”；而“零散化”是“少而精”，讲究效用。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无效的信息不仅造成视觉污染和信息空间的浪费，而且无端地阻塞信息通道，阻碍人们对有效信息的利用。

实事求是也好，实践标准也好，话语模式也好，说到底，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20年改革开放，最重大的收获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中国人民成熟了，中国的领导人成熟了。就像一个人一样，从一个年纪轻、好冲动、好走极端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一个见多识广，头脑灵活的成年人。从“改革开放”到“一国两制”，从人治到法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这一切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无不体现着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的空前的成熟和智慧。总之，解构与重组，这是20世纪末世界的主题，更是中国的主题。

本书上篇主要以邓小平理论为前提，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正是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我们认识、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可能性。

公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现的许多“左”的问题，几乎全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的结论，终于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按劳分配问题，也是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的研究表明，多年来，我们对于按劳分配问题的研究，也像对公有制的研究一样，基本上没有搞清楚。多年来，由于否定了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们不可能正理解按劳分配这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当我们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对这个重要的分配原则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我们几十年来几乎从来没有真正

实行过按劳分配，只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才得以出现。只有对劳动的真正尊重，才有可能实行真正意义的按劳分配。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把按劳分配理解为劳动者不仅获得维持他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劳动力的价值（即资本主义的工资），而且一定程度地参与分割利润。这种理解不仅使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划清了界限，而且与传统的“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划清了界限。此外，也只有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真正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才有可能出现。它是广大劳动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可靠保障。

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这个研究成果，为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条件，似乎对许多问题的清理工作一下子明朗起来了。与其他的研究不同，我们并不否认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具有本质性的意义。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我们过去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三个重要内容，其认识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对过去那种简单拍脑袋式的所谓计划经济进行分析，因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分析没有必要了。计划永远都是必要的，问题是怎样理解计划和怎样计划。有一点是明确的，唯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科学的经济计划才是可能的。

由于对传统社会主义本质诸内涵的重新理解，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他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与收入差别、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社会主义、新集体主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才可能得出了令人满意的结论。如果说过去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建立在“普遍贫穷”基础上的，那么，我们今天探讨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建立在

“共同富裕”基础上的。而对按劳分配的重新理解，为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依据。

本书的下篇着重要做的是对一种传统哲学或传统思维方式的批判，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扫清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思想障碍。与我们多年来在对待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诸多误解一样，我们多年来在哲学上也有一个很大的误解，那就是把旧哲学中的唯物论错当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即没有划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旧唯物论的界线。

我们知道，旧唯物论是与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相联系的，是唯物辩证法。但是，由于没有把马克思的唯物论和旧唯物论区分开来，所以，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确切涵义。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哲学上的一段不解的公案，直到 20 年前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才把这个问题逐渐提了出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唯物论的重新理解问题，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相信随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重新理解，从哲学层次上进行更深入的清理工作，将成为一件不可回避的事情。邓小平同志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大部头的哲学著作，但是，他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解决哲学疑难问题的方法论基础已经奠定，留给哲学家的只是各种具体的清理工作。

我们在下篇中开展的对于传统思维方式的批判，以及对于旧唯物论的批判等等，依据的都是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哲学思维方式。在我们对各种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研究时，我们深深地感到，如果不对这些哲学问题进行比较深入地研究，就不可能真正解决“实事求是”这个方法论问题。因此，如果不对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新唯物论原则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博大精深的邓小平理论。试想，一个连新旧唯物论